

巴西研究专题

巴西气候外交战略： 演进历程、策略调整及全球影响

赵书浩

内容提要：在全球多极化趋势日益显著的背景下，“硬实力”不均衡现象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战略实施面临多重挑战。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巴西依托亚马孙雨林资源，积极开展气候外交战略。经过自卡多佐政府以来约 30 年的实践，巴西已构建起涵盖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级的气候外交框架，涉及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气候治理、亚马孙主权和国际化冲突等领域。巴西气候外交经历了强化期（1994—2016 年）、弱化期（2017—2021 年）、创新期（2022 年至今）的阶段性演进。巴西的气候外交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治理结构层面，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深化与完善；在国际协作层面，实现了多边多领域的气候治理协调互动；在治理主体层面，塑造了“全球南方”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在能源转型层面，带动了全球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与合作。未来，气候外交仍将是巴西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在此背景下，中巴气候合作不仅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领域，也将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持续深化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巴西 气候外交 多层次治理 亚马孙雨林 气候谈判

作者简介：赵书浩，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6649 (2025) 04 - 0134 - 28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多极化加速演进，传统强国秉持霸权思维，极力打压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以维护其自身霸权和优势地位。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局初现端倪：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硬实力对比上差距加大；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亟须提高自身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力。为破解困局，部分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推动外交战略的深刻转型，实施“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比较优势”策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以作为融入并引领全球合作的关键路径。巴西开始逐步提升自身地位和影响力。长期以来，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巴西被赋予“中等强国”“地区大国”的身份，但其国际战略实施受国内经济发展颓势影响，20 世纪末在国际上面临被边缘化风险。对此，巴西及时调整了国际战略安排，聚焦全球气候治理与合作，发挥亚马孙雨林的先天优势和清洁能源结构的后天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被边缘化的风险。本文在构建巴西气候外交战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梳理巴西气候外交战略的演进历程，剖析巴西气候外交策略的调整，考察巴西气候外交战略的全球影响。

一 巴西气候外交战略分析的理论框架

鉴于全球气候问题复杂性持续深化、紧迫性日益凸显，推动多要素、多层次治理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趋势，适应全球气候治理成为一个多层次挑战。^① 在此背景下，探讨实现对气候变化的多层级治理成为学术界分析的焦点。

（一）多层级治理理论

多层级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源于学者对欧盟实践的研究，随后逐渐演变为政策制定领域的惯用概念。多层级治理不仅为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范例，亦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一种理论流派和实践模式。1993 年，美国教授加里·马克斯（Gary Marks）用多层级治理理论来总结欧盟新的治理机制^②，彼时，欧洲正经历由主权国家政府式微向新集

^① J. Gonzales-Iwanciw, A. Dewulf and S. Karlsson – Vinkhuyzen, “Learning in Multi-level Governance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 Literature Review”, i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Vol. 63, No. 5, 2002, pp. 779 – 797.

^② A. H. Schakel,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a ‘Europe with the Regions’”, 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2020, pp. 767 – 775.

体化治理体系转变的过程。此后,该理论的内涵及治理层次划分不断拓展。加里·马克斯与利斯贝特·霍格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表明政治权力及决策力具有多层级属性,即国家权力区域分散化,向超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及公共网络拓展和转移。^①换言之,该理论强调权力的分散与多层级属性,反对将权力归属于单一层级^②,主张不同层级之间的互动与牵制,以实现权力“善治”。随着全球性公共事件认知及全球治理的深化,马克斯及霍格的多层级治理理论对认知超国界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构建了新的研究范式,并逐渐拓展为涵盖传统国界内外的更为广泛的治理体系。^③

对于多层级理论的内涵范畴,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认知和判断。科勒—科赫等认为“层级”存在两种理解路径:其一是指不同层级政权,包含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及次国家行为体三个不同层级,多层次治理旨在实现不同层级间的协作和适应;其二是将“层级”理解为不同的“情境”或“场域”,指诸类问题不能理解为简单的政治问题,而应在结合其背景的状况下做出综合性判断和层次性认知。^④科勒—科赫等学者将多层级治理理论的实现路径细化为纵向、横向及等级三个层面:在纵向层面,通过任一层级实现的治理成效既能向上传递至第一层级,也可向下传递至最低层级;在横向层面上,主要指基于自身意愿行动并与多元主体间开展的治理举措;在等级层面上,主要强调第一层级或较高层级对下属层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换言之,实现更高层级治理的基础在于较低层级治理的有序实现。^⑤此外,还有研究将治理结构细化为四个层级,即国际层级、国家层级、地方层级及基层层级。^⑥总而言之,相关研究均强调治理实现的“层级化”,即解决某一问题的路径绝非单一

① Simona Piattoni, “Multi-Level Governance: A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Analysis”,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31, No. 2, 2009, pp. 163–180.

② Arthur Benz and Burkard Eberlein, “Regions in European Governance: The Logic of Multi-Level Interaction”,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1998, p. 254.

③ 王联合、焦莉:《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多层级治理视角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4期,第39–63页。

④ [德]贝娅特·科勒—科赫等著,顾俊礼等译:《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⑤ Kern Kristine, “Cities as Leaders in EU Multilevel Climate Governance: Embedded Upscaling of Local Experiments in Europe”, i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28, No. 1, 2019, pp. 125–145.

⑥ 张继亮、熊瑞涛:《多层级制度框架下的空气污染治理:印度的实践与启示》,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88–95页。

层级行动，而是有赖于多层次之间的互动和依赖。^①同时，应避免多层次治理机制的“绝对化”。欧盟多层次治理的实现建立在欧盟成员国“主权让渡”的基础之上，但国家行为体仍是参与多层次治理的重要主体，其自身属性使其具备其他行为体所不具备的治理优势。基于上述认知和判断，本文借鉴多层次治理理论，认为实现某一问题的治理取决于多层次之间的相互依赖与配合，同时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相互传导机制，任一层级的治理成效都会对治理整体产生重要影响。

（二）多层次治理理论视域下的气候外交

作为一种新形态外交，气候外交以全球气候治理谈判为核心，以气候治理责任划分及减排目标设定与执行等为主要内容。一般而言，全球气候治理包含如下四类目标：一是实现气候政策的多边主义，二是应对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三是加速国内行动以助力全球治理，四是通过宣传和对外拓展加强国际合作。基于此，欧洲气候智库阿德尔菲（Adelphi）的部分学者指出，气候外交是利用外交工具支持本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主张，以实现本国抱负和全球气候“善治”的多边活动。^②与日趋严峻的气候危机相悖的是，气候变化已然成为一个地缘政治问题。随着国际体系结构的快速重构和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显著升级，全球气候治理的“全球公利”价值观遭到一定程度的侵蚀，全球气候治理竞争趋于常态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举措视为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工具。^③在此背景下，为有效应对国家在气候议题上所面临的“群体化”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国际社会亟需转向多层次的协同治理模式，以期达成全球气候的“善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全球所有国家需通力合作，采取集体行动，同时也要求无论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团体还是私有部门等各类行为体均能在其职责范围内贡献力量，形成上下联动、内外互补的治理合力。

综观既有研究，学术界已将研究焦点逐渐转向气候外交领域中的多层次

① 陈亮：《欧盟气候多层治理进程中生态城市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载《城市学刊》，2015年第4期，第1-5页；马丁·耶内克、刘凌旗：《全球气候治理的横向与纵向强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2期，第67-76页；袁倩：《多层次气候治理：现状与障碍》，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5期，第171-180页。

② Detges Adrien et al., “10 Insights on Climate Impacts and Peace”, June, 2020. <https://adelphi.de/en/publications/10-insights-on-climate-impacts-and-peace>. [2024-06-10]

③ 张蓓：《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载《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4期，第13-24页。

治理框架,认识到气候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多层级的治理行动,实现全球气候“善治”离不开多层次协调互动。^①例如,气候外交一直在美国外交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拜登政府时期,气候治理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美国的气候外交战略聚焦全球、区域及双边三个层级:在全球层面致力于塑造美国的全球信誉和气候领导力;在区域层面借助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塑造气候治理“小圈子”和“小多边”群体;在双边层面加强与盟伴的治理合作,同时注重与中国、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气候外交行动。^②与之相反,巴西、印尼、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具备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强势气候外交战略的实力,因此,采取“柔性”气候外交战略、发挥自身优势或为可行之径。东盟集团作为一个小国集团,以一体化形式参与全球气候谈判,采取单边、双边和多边三种形式的气候外交,遵循“权力平衡”的外交逻辑,使东南亚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③但是,在多层次气候治理体系下,气候议题亦遭遇边缘化困境:在全球层面上,大量治理机制的存在导致国际气候制度出现碎片化趋势;在国家层面上,不同国家的利益及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成为气候治理合力形成的阻碍。^④

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化,通过多层次治理推进全球气候“善治”已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应有之义。尽管目前多层次治理面临机制缺陷和利益分歧,但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仍是实现多层次治理,相关国家的气候外交实践亦印证了这一治理路径的可行性。

① 张丽君:《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气候外交中的价值分析》,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15-23页;冯存万:《法国气候外交政策与实践评析》,载《国际论坛》,2014年第2期,第57-62页;冯存万、朱慧:《欧盟气候外交的战略困境及政策转型》,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4期,第99-113页;朱慧:《东盟气候外交的“小国联盟”外交逻辑及其功能性分析》,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34-39页;关孔文、房乐宪:《从华沙到巴黎:欧盟气候外交政策的新趋势》,载《和平与发展》,2016年第4期,第82-93页;李慧明:《全球气候治理新变化与中国的气候外交》,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29-39页;冯帅:《特朗普时期美国气候政策转变与中美气候外交出路》,载《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5期,第109-126页。

② 张玉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载《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4期,第50-65页。

③ 朱慧:《东盟气候外交的“小国联盟”外交逻辑及其功能性分析》,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34-39页。

④ 袁倩:《多层次气候治理:现状与障碍》,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5期,第171-180页。

（三）多层级治理视域下的巴西气候外交分析框架

如上所述，随着全球气候治理复杂性急剧上升，各种利益互动趋于尖锐，单一层级治理方式难以支撑气候问题的整体解决，运用多层级治理理论解决全球气候治理的机制缺陷和利益分歧的适用性因而显现。在全球气候治理参与中，力量对比是影响不同行为体气候治理成效的关键，掌握硬实力的传统大国往往占据气候治理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然而，也有个别国家另辟蹊径，充分发挥外交的主动性与可选择性，利用自身在优势领域的影响力开展“优势外交”^①，例如加拿大、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北极外交^②，印度的清洁能源外交^③等。巴西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在获取全球地位和资源时，亦面临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诸类条件制约，但拥有亚马孙雨林这一自然资源成为巴西主动参与气候治理的优势基础，也使气候治理成为巴西无法摆脱的重要议题。因此，对于巴西的气候外交研究是有必要、有价值的。

基于学术界相关研究，本文借助多层级治理理论建构巴西气候外交的分析框架，具体包括纵向和横向各三个层级，并按时间跨度进行分阶段分析，从而形成了一个三维立体分析框架（见图1）。在纵向层级划分上，本文选择三层级架构，即全球、区域及国家三个层级；在横向层级划分上，本文参照现代社会结构将其划分为政府、市场及社会三个层级，其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而市场和社会亦对治理产生影响。^④需要指出的是，各层级绝非孤立的个体，每一层级均由若干个体组成，而层级内部各个体及各层级间都存在互动，互动方式表现为合作与冲突两种形式。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本文对20世纪90

① Mark Beeson, Alan Bloomfield, and Wahyu Wicaksana, “Unlikely Allies? Australia, Indonesia and the Strategic Cultures of Middle Powers”, in *Asian Security*, Vol. 17, No. 2, 2021, pp. 178–194.

② 付云清：《加拿大北极政策转变：表现、动因与挑战》，载《国际研究参考》，2020年第12期，第21–28页；黄凤志、冯亚茹：《俄罗斯的北极政策探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133–144页；于游：《俄罗斯北极战略调整与中俄北极合作》，载《东北亚学刊》，2024年第4期，第52–67页；侯典芹、侯胜一：《从“结构性外交”视角看欧盟的北极政策》，载《区域与全球发展》，2023年第3期，第49–65页；Vahid Nick Pay and Harry Gray Calvo, “Arctic Diplomacy: A Theoretical Evalua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High North”, in *Russian Politics*, Vol. 5, No. 1, 2020, pp. 105–130.

③ 张锐：《印度清洁能源外交：能源革命与大国战略驱动下的外交实践》，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6期，第139–153页；姜波：《印度绿色能源外交行为模式探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24年第2期，第26–47页。

④ 张继焦：《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不同作用》，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62–69页。

年代卡多佐政府以来的巴西气候外交战略予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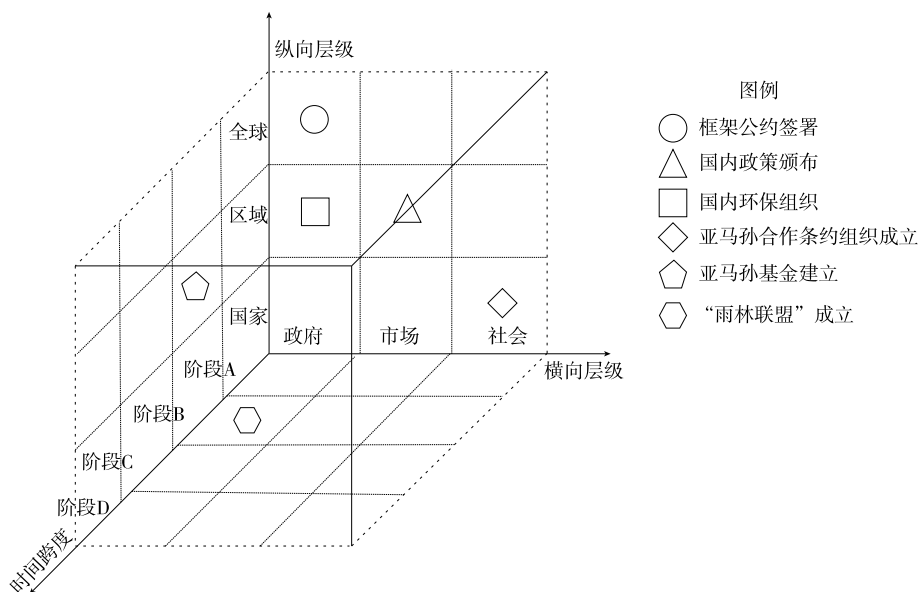


图1 多层次治理视域下的巴西气候外交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 巴西气候外交战略的演进历程

巴西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可追溯到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与民选政府初期（1985—1995年）相比，自卡多佐政府以来的历届巴西政府均将气候外交视为实现其国际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巴西的气候治理及外交战略展现出明显的多层次特征，涵盖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级的互动。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巴西的气候外交战略具备稳定的共识和广泛的参与基础，具有承诺持续性和政策连贯性。然而，从短时段的视角分析，巴西的气候外交具有显著的阶段性演进特征，反映出不同政府时期的外交优先级和政策重点差异。

（一）巴西气候外交的强化期（1994—2016年）

1. 全球层面：全球气候谈判身份的转变

巴西在这一时期致力于发挥自身价值，努力构建和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并将融入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作为该时期巴西气候外交战略的核心目标。

特别是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和谈判进程的起步阶段，巴西积极推行气候外交战略，强化多层级合作，为后续气候外交的持续推进奠定坚实基础。从全球层面看，这一时期巴西逐渐由全球气候谈判的纯粹参与者转变为南北方国家间的协调者。

卡多佐执政时期，巴西外交的独立性显著加强。^① 1995 年，在首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卡多佐主张“制定明确的减排数字是后续措施和政策实施的先决条件”，并强调发达国家对全球减排的历史责任。^② 两年后，在第三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西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抵制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坚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时至今日，该原则仍旧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谈判的核心原则。同时，巴西提议设立清洁发展基金，并与美国共同开创清洁发展机制，由此既缓解了发达国家对减排义务的抵触，也使发展中国家得以通过碳汇交易获得外汇支持。2001 年，卡多佐政府认为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严重“倒退”，并强调巴西批准该协议是巴西全球环境义务的应有之举。^③

劳工党执政时期，巴西采取了更为强力的气候外交策略，促成了巴西在气候谈判方面的身份转变。2007 年，巴西成立“气候变化部际委员会”，提升了气候战略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同年，巴西颁布第 6263 号法案，通过了巴西国家气候变化计划（PNMC），首次就毁林问题制定具体的减排目标。^④ 在强有力的气候外交策略推动下，巴西在气候谈判中不仅主动承担了减排责任，还要求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问题上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在第十二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西提出建立“全球基金”以应对毁林问题。在第十三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西支持制定“巴厘岛路线图”。2009 年，巴西坚决反对《哥本哈根协议》，认为该协议实质是发达国家欲将强制性减排义

① 周志伟：《卢拉政府外交政策评析及未来外交政策走向》，载《拉丁美洲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44 - 50 页。

② UNFCCC, “Informe de la Conferencia de las Partes Sobre su Primer Período de Sesiones, Celebrado en Berlín del 28 de Marzo al 7 de Abril de 1995. Adición. Segunda Parte: Medidas Adoptadas por la Conferencia de las Partes en su Primer Período de Sesiones. Corrección”. <https://unfccc.int/documents?f%5B0%5D=conference%3A3850>. [2024 - 06 - 10]

③ Chen Gang, “The Kyoto Protocol and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4, 2007, p. 535.

④ Doug Boucher, Pipa Elias, et al., “Brazil: The World’s Biggest Reductions in Deforestation and Emissions”, in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2014, pp. 7 - 13.

务转变为相互监督的“自主化”减排。巴西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双轨”谈判机制，并公开批评发达国家的减排政策。为促进温室气体减排长期安排的达成，在第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西在非洲集团的支持下提出并成立了“特设工作组”，负责 2020 年后的温室气体减排规划。在第十八至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围绕减排安排及气候协议达成，巴西提供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案。^① 在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缔约国达成《巴黎协定》，巴西率先做出减排承诺。2015 年，罗塞芙公布了发展中国家的首份自主贡献报告，就减排等事务做出明确规划。

2. 区域层面：凝聚亚马孙地区治理合力

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不断深化，亚马孙地区的治理已成为巴西周边外交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充分利用其丰富的雨林资源，凭借这一天然优势积极推动亚马孙地区的治理形成合力。通过强化区域合作与多边机制，巴西致力于推动亚马孙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升该地区在全球环境议程中的战略地位。

其一，加强与亚马孙地区周边国家的合作。1978 年，由巴西牵头、亚马孙地区周边国家签署《亚马孙合作条约》，奠定了雨林资源规划的合作基础；1998 年，根据该条约修正议定书，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ACTO）成立。该组织的建立打消了巴西军政府时期周边国家对雨林驻军和过度开垦的担忧，塑造了巴西在亚马孙地区治理中的领导地位。

其二，充分利用雨林资源，推动亚马孙地区国家与发达国家良性互动。在第十三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卢拉总统提出建立亚马孙基金，向发达国家筹集资金支持亚马孙地区的可持续发展。^② 巴西的这一主张不仅为亚马孙地区国家气候治理争取了资金支持，而且推动联合国讨论由毁林所致的温室气体排放（REDD+）问题。2008 年，亚马孙基金建立，德国和挪威为主要出资方。同年，巴西与法国共同建立亚马孙地区研究中心。2009 年，法国因法属圭亚那之故受邀参加亚马孙地区国家首脑峰会。此次会议上，卢拉要求

^① 例如，第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西提出三项主张：其一是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尽快启动德班平台谈判，其二是公平划分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其三是赋予德班增强行动工作组以约束力。

^② 陈岚：《影响气候援助有效性的因素：基于巴西雨林保护试点项目与亚马孙基金的比较》，载《拉丁美洲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85-102 页。

发达国家为雨林保护提供支持，以弥补几个世纪前的殖民砍伐。^① 可见，巴西致力于利用自身影响力及雨林资源优势，向世界传递亚马孙国家声音，并在维护自身主权的基础上，为雨林保护争取外部支持。

其三，注重与雨林资源分布区国家的合作。巴西政府将同雨林资源分布区域国家的气候合作视为巴西气候外交的重要方向。在第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西和印尼等国在谈判中引入了“热带雨林保护补偿机制”，为雨林国家的气候治理争取了外部资源。第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形成决议，通过国家自主行动减少砍伐，并依据由毁林所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框架减少国家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

3. 国家层面：引领发展中国家气候治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巴西将其国家定位由“第一世界国家”转变为“第三世界国家”，由此实施了巴西外交战略的调整。^② 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强化发展中国家间的气候治理合作、公平划分气候治理责任成为巴西参与全球治理的可取选择。

首先，在“七十七国集团 + 中国”框架内坚持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不可分割的立场，强调不能以牺牲国内经济增长为代价来实现环境目标。^③ 在 1995 年首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西提议加强“七十七国集团 +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基础地位。1998 年，巴西与七十七国集团及中国共同抵制对发展中国家的强制减排要求，积极引导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意愿，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此外，巴西还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气候治理的资金支持，这一立场与“七十七国集团 + 中国”及“基础四国”机制产生了共鸣。^④ 1997 年，巴西提出建立补偿机制，并与美国合作推动在《京都议定书》中确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在 2009 年第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西主动承诺到 2020 年减排 36% ~ 39%，并坚持要求发达国家承担主要减排责任。巴西

① “Brazilian President Says ‘Gringos’ must Pay to Protect Amazon. Speaking Before Amazon Summit, Lula Calls o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to Provide Financial Help to Halt Deforestation”, November 27, 2009.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nov/27/lula-gringos-pay-protect-amazon>. [2024-06-18]

② 周志伟：《巴西国际战略研究：理念、实践及评估》，载《晋阳学刊》，2019 年第 4 期，第 80 - 88 页。

③ 赵斌：《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巴西与南非——历史进程、变化动因与身份选择》，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 年第 4 期，第 74 - 86 页。

④ Eduardo Viola, “O Brasil nas Políticas de Governança Global e Mudança Climática, 1989-2003”, em *Revista Ambiente e Sociedade*, Vol. 7, No. 1, 2004, p. 32.

的气候治理行动体现了其发展中国家“引领者”的定位。在第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西治理方案”^① 架构被“七十七国集团 + 中国”广泛采纳，进一步巩固了巴西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影响力。

其次，注重在“基础四国”机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2009 年，在第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逐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四国多次重申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立场，即坚持《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双轨制”不动摇，坚决抵制此次会议上提出的“丹麦方案”。“基础四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同发达国家展开斡旋，维护自身及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权益。尽管“基础四国”内部的利益主张存在一定差异，但该机制仍是全球气候治理中重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因为四国排放量的改善对减缓全球碳排放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与同期所有发达国家减排总贡献相当。^②

最后，注重与发展中国家的双多边气候合作。20 世纪末以来，随着巴西外交定位的调整，强化与非洲大陆的合作成为其南南合作的两大支柱之一。^③ 巴西借助其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积极与非洲大陆国家开展气候合作。2005 年，卢拉出席首届非洲—南美峰会，与尼日利亚在气候、能源等领域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2007 年，巴西为尼日利亚“生物燃料城”项目提供 1 亿美元的投资。2009 年，巴西与莫桑比克达成 60 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协议。^④ 此外，葡语国家共同体、印度—巴西—南非论坛和金砖国家机制等也为巴西开展面向非洲国家的气候外交提供了重要平台。

（二）巴西气候外交的弱化期（2017—2021 年）

在劳工党执政后期，巴西经济衰退和社会压力日益加剧。2016 年，罗塞芙总统被弹劾下台，上一阶段巴西所实施的积极气候外交战略因执政党的更迭等因素而发生了显著转变。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去气候化”

① 此次会议上，巴西代表团向缔约方递交提案，建议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制定一份通用的简化方法，使缔约方能够根据历史数据量化各国对气候变化的贡献，以供缔约方审议。巴西还积极推动设立永久性的“REDD +”融资机制和基于成果支付架构，此举旨在为发展中国家减缓排放和加强气候变化适应提供必要的支持。

② 王海林、刘滨、潘勋章：《基础四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历史贡献、新挑战与对策》，载《环境经济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 126—136 页。

③ 周志伟：《新世纪以来的巴西对非政策：目标、手段及效果》，载《西亚非洲》，2014 年第 1 期，第 125—140 页。

④ Fantu Cheru and Renu Modi (ed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The Impact of Chinese, Indian and Brazilian Investments*, London: Zed Books, 2013, pp. 145—158.

政策，而巴西国内极右翼总统博索纳罗也公开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在此背景下，巴西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其气候政策趋于保守，表现出明显的“亲美”倾向。

1. 全球层面：主权冲突带动战略保守化

巴西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始终强调主权关切，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其重视程度有所差异。在博索纳罗右翼政府执政期间，巴西更加突出气候治理的主权导向，导致其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和平台的参与有所削弱。

其一，巴西的气候外交呈现逆全球化趋势。2018年7月，博索纳罗在竞选时表示他胜选后将推动巴西退出《巴黎协定》；10月，他再次表示只要不威胁巴西主权，将让巴西继续留在联合国气候公约之中^①；11月，巴西政府宣布因预算不足而撤回对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承办申请，尽管巴西环境部官员表示，“国家预算问题已得到解决，且国家气候资金储备充足，足以完成大会筹备。”^②可见，撤回申请或是由于新政府对待气候治理态度转变所致。

其二，指责并拒绝发达国家的气候治理援助。2019年6月，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博索纳罗指责气候治理是发达国家的“谎言”，声称“我们了解亚马孙对世界的重要性，但亚马孙是我们的，不会再出现我们过去看到的那种对每个人来说都可怕的政策”^③。8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指责博索纳罗在大阪峰会上“撒谎”，并指责巴西的森林砍伐严重危害全球气候，由此引发了两者间一场相互指责的争论。马克龙坚称亚马孙森林火灾是一场国际性气候灾难，并将其纳入七国集团会议议程。博索纳罗则指责马克龙的言论是“对巴西主权的不尊重”，认为在七国集团会议上讨论巴西的亚马孙火灾问题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行径。^④事实上，七国集团就此次火灾通过了一项200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并提出开展一项关于雨林保护的长期倡议，但相关援助

① M. Darby, “Brazil: Bolsonaro Threatens to Quit Paris Climate Deal”, in Climate Exchange News, August 14, 2018. <https://www.climatechangenews.com/2018/08/14/brazils-bolsonaro-threatens-quit-paris-climate-deal/>. [2024-06-18]

② 《巴西放弃申办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新华网，2018年11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1/29/c_1123784131.htm. [2024-06-18]

③ Francesca Varrese, “The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eservation in the 2019 Amazon Deforestation”, IPE 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2020.

④ Amazon Fires, “Merkel and Macron Urge G7 to Debate ‘Emergency’”, August 23, 201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49443389>. [2024-06-18]

均被博索纳罗政府拒绝。

其三，为自身现状进行缺乏现实依据的辩护。在维护巴西气候治理主权的同时，博索纳罗政府为本国的气候治理现状进行辩护，但事实上其大部分辩护缺乏现实依据。在 2019 年联合国大会上，博索纳罗声称，“亚马孙地区的面积比整个西欧还要大，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们是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之一。亚马孙雨林火灾受到国际上很大部分媒体耸人听闻的攻击，这唤醒了我们的爱国情怀。”^① 在次年大会上，博索纳罗同样对发达国家有关亚马孙雨林火灾的言论进行了谴责，“肯定”巴西的气候治理举措。事实上，亚马孙雨林火灾的发生正是毁林开荒所致，且该时期巴西境内的毁林面积呈逐渐增长态势。^②

2. 区域层面：亚马孙地区治理能力弱化

在区域治理方面，由巴西主导并塑造的亚马孙地区治理机制在这一时期趋于弱化。地区国家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对举措表明，尽管该地区存在形式上的治理框架，但实际上的治理效能并未得到保障，暴露出地区治理的“表象化”特征。

2016 年，特梅尔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讲到，“巴西拥有世界上最清洁的能源矩阵，巴西是一个环境强国，对环境有着坚定承诺，”^③ 并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巴黎协定》的批准书。2017 年，特梅尔再次强调了巴西的气候治理成效，声称“我们坚定致力于支持《巴黎协定》。在亚马孙地区……去年的第一个可用数据表明该地区的森林砍伐减少了 20% 以上”^④。然而，实际情况截然相反。特梅尔执政以来放宽了对亚马孙雨林砍伐的限制^⑤，导致巴西境内亚马

① Amazon Fires, “Merkel and Macron Urge G7 to Debate ‘Emergency’”, August 23, 201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49443389>. [2024-06-18]

② Michael Slezak and Mark Doman, “The Amazon Rainforest Fires Continues to Burn and There Are Fears that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September 19, 2019. <https://www.abc.net.au/news/2019-09-19/satellite-images-of-amazon-reveals-human-impact-of-fires/11478580>. [2024-06-18]

③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Speech by President Michel Temer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1st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 New York”, September 20, 2016. <https://www.gov.br/mre/en/content-centers>. [2024-06-18]

④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Statement by H. E. Mr. Michel Temer, President of the 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 – Opening of the General Debate of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 New York”, September 19, 2017. <https://www.gov.br/mre/en/content-centers/speeches-articles-and-interviews/president-of-the-federative-republic-of-brazil/speeches>. [2024-06-18]

⑤ 针对帕拉州贾曼西姆国家公园和圣卡塔琳娜州圣若阿金国家公园的 MP756 号法案被全面否决。其中，前者 486000 公顷的重点保护区将转变为普通环境保护区，允许私人占有、采矿和农业开发；后者的重点保护区面积也由 49000 公顷减少到 39000 公顷。

孙雨林砍伐增长 29%^①。2019 年，博索纳罗废止了“预防和控制亚马孙地区森林砍伐行动计划”，同年 8 月，巴西帕拉州雨林发生火灾，波及巴西北部诸州及邻国。为此，玻利维亚总统呼吁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成员国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而博索纳罗以健康问题为由缺席了此次会议，仅发表了视频讲话，且讲话内容仍围绕此前其与马克龙之间的相互指责。这次火灾的发生及应对不力表明了巴西在引领亚马孙地区国家实现综合治理能力上的不足。博索纳罗长期抨击亚马孙基金，其在相关问题上的保守政策最终导致德国和挪威暂停了对亚马孙基金的资助。

3. 国家层面：气候政策及合作“亲美化”

巴西气候外交战略受美国政策影响显著。一直以来，博索纳罗因其执政理念和风格与特朗普相似而被称为“巴西特朗普”。博索纳罗执政后，在对外事务上紧跟美国。特朗普认为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在其执政期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而博索纳罗在竞选时即宣称，他若当选会带领巴西退出《巴黎协定》。博索纳罗首次出访选择美国，凸显了美国在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② 拜登政府上台后，博索纳罗维持了与美国相似的国际气候治理立场。2021 年，美国政府公布新的气候治理目标。此后不久，在世界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博索纳罗宣布巴西将提前十年实现零排放目标，并且一改此前对发达国家参与亚马孙治理的谨慎态度，主动表示希望获得美国的资金支持。5 月，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表示，“应对气候危机需要有影响力的全球伙伴关系，巴西将成为制定和实施这场危机解决方案的关键合作伙伴。”^③ 在 2022 年第九届美洲峰会召开前夕，博索纳罗和拜登发表共同声明，表示两国将共同致力于国际气候谈判，促进亚马孙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等。^④ 可见，该阶段巴

① Rhett Ayers Butler, “Brazil: Deforestation in the Amazon Increased 29% over Last Year”, November 30, 2016. <https://news.mongabay.com/2016/11/brazil-deforestation-in-the-amazon-increased-29-over-last-year/>. [2024-06-18]

② 此前巴西总统就任后的首访一直选择阿根廷。卢拉于 2023 年再次就任巴西总统后，首访同样选择了阿根廷。

③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Sets 2030 Greenhouse Gas Pollution Reduction Target Aimed at Creating Good-Paying Union Jobs and Securing U. S. Leadership on Clean Energy Technologies”, April 22, 2021.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22/>. [2024-06-18]

④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Brazil, “Readout of the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s Biden and Bolsonaro at the Summit of the Americas”, June 10, 2022. <https://br.usembassy.gov/readout-of-the-meeting-between-presidents-biden-and-bolsonaro-at-the-summit-of-the-americas/>. [2024-06-18]

西与美国在气候治理上具有高度协调性，巴西的气候政策及国际合作“亲美化”明显。

（三）巴西气候外交的创新期（2022 年至今）

随着 2022 年卢拉再次执政，巴西亟须重塑气候治理大国身份，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持续深化。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中的关键难点和挑战，为改变在全球和区域气候治理中的边缘化趋势，卢拉政府从气候融资、亚马孙地区治理及多边气候外交等多个角度共同发力。

1. 全球层面：推动气候治理融资开放化

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实力有限且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处于接受援助和被约束的地位。^① 亚马孙地区治理则显著受益于卢拉首次执政时期成立的亚马孙基金。博索纳罗时期，挪威和德国暂停了对该基金的资金支持，使亚马孙基金合作一度陷入停滞。为此，卢拉再次执政后首日便签署法令恢复了亚马孙基金。一方面，卢拉政府寻求德国和挪威两国继续提供资金支持。2013 年 1 月和 12 月，德国和挪威先后宣布向亚马孙基金提供 3800 万和 5000 万美元捐助。另一方面，巴西进一步拓展亚马孙基金的资金来源。2022 年 11 月，刚刚胜选的卢拉便呼吁英国、法国等国家加入亚马孙基金。次年 5 月，英国首相苏纳克宣布英国将向亚马孙基金捐助 5 亿雷亚尔^②；6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未来三年法国将向亚马孙基金捐助 5 亿欧元^③；10 月，美国正式捐助 300 万美元，瑞士捐助 500 万瑞士法郎^④。

卢拉积极开拓新的气候融资机制。2023 年 9 月，卢拉在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批评发达国家的气候承诺，“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拨款 1000 亿美元的承诺仍然只是一个承诺。如今，这一数额不能满足已经达到数万亿

① 王飞：《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的困境与突破——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例》，载《城市与环境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65—81 页。

② Planalto, “British PM Rishi Sunak Announces Contribution to the Amazon Fund ‘in Tribute to President Lula’s Leadership on this Issue’”, May 5, 2023. <https://www.gov.br/planalto.html/en/latest-news/2023/05>. [2024-06-18]

③ Agencia Brasil, “France to Donate €500 Million to Brazil’s Amazon Fund”, December 4, 2023. <https://en.mercopress.com/2023/12/04/france-to-donate-500-million-to-brazil-s-amazon-fund>. [2024-06-18]

④ “Switzerland, US Donate \$8 Million to Brazil’s Fund to Fight Amazon Deforestation”, October 4, 2023.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vironment/switzerland-us-donate-8-million-brazils-fund-fight-amazon-deforestation-2023-10-03/>. [2024-06-25]

美元的需求。”^① 事实的确如此，发达国家做出的每年向发展中国家资助 1000 亿美元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承诺至今仍未兑现。2023 年 11 月，卢拉在二十国集团巴西峰会上向与会各方呼吁完善国际气候融资机制，提议多边开发银行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举措以分配更多资源。卢拉政府提出建立“永久热带雨林”基金，由政府 and 私营部门共同出资，基金总额 2500 亿美元，旨在向达到限制毁林阈值的热带雨林国家拨款以帮助其应对森林砍伐问题。2024 年 7 月，巴西宣布加入由阿联酋发起的“全球气候融资框架”，该框架涵盖气候融资领域多个议程，包括制定多边开发银行工作机制，履行此前承诺等事项。^② 在 11 月的二十国集团巴西峰会上，巴西呼吁设立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NCQG），以每年 1000 亿美元的最低限额作为新的集体量化标准，并优先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需求。^③ 这一议案预计也将成为 2025 年第三十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核心议题。

2. 区域层面：重塑亚马孙地区治理合力

巴西牵头的亚马孙地区治理机制日益完善，这些机制大多建立于卢拉首次担任总统时期，在博索纳罗时期部分机制被削弱或废止，导致巴西在引领亚马孙地区治理中的能力弱化，地区治理合力趋于肢解。2021 年的亚马孙雨林火灾及应对不力充分暴露了这一问题。2023 年 1 月，卢拉重新执政不久即重提召开亚马孙国家峰会。8 月，在峰会召开前夕，卢拉与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秘书长亚历山德拉·莫雷拉会面时讲到，“巴西致力于捍卫并加强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积极推动亚马孙地区的保护和开发合作”^④。次日，卢拉在亚马

①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Speech by President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at the Opening of the General Debate of the 78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 New York”, September 19, 2023. <https://www.gov.br/mre/en/content-centers/speeches-articles-and-interviews/president-of-the-federative-republic-of-brazil/speeches>. [2024-06-25]

② João Nakamura, “Brasil Entra em Pacto de Financiamento para Combater Mudanças Climáticas”, July 7, 2024. <https://www.cnnbrasil.com.br/economia/macroeconomia/brasil-entra-em-pacto-de-financiamento-para-combater-mudancas-climaticas-diz-haddad/>. [2024-06-25]

③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Brasil Reforça Chamado a Paamadodo G20 por Liderança em Financiamento Climncico”, November 8, 2024. <https://www.gov.br/mma/pt-br/assuntos/noticias/brasil-reforca-chamado-a-paises-do-g20-por-lideranca-em-financiamento-climatico>. [2024-06-25]

④ Planalto, “Brazil’s Lula Defends Strengthening Amazon Cooperation Treaty Organization in Meeting with ACTO Secretary General”, August 8, 2023. <https://www.gov.br/planalto/en/latest-news/2023/08>. [2024-06-25]

孙国家峰会上提出“新亚马孙梦想”^①，承诺至 2030 年实现森林零砍伐。

此次亚马孙国家峰会达成了《贝伦宣言》，宣言聚焦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的机构强化、气候治理、保护森林和脆弱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等 11 个专题。此次峰会成果不仅将原本趋于离心的亚马孙地区治理重新拉回正轨，也进一步增强了巴西对亚马孙地区治理的影响力。在 2023 年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卢拉宣布启动“恢复之弧”计划，由巴西国家开发银行拨款 2.05 亿美元用于恢复亚马孙地区 6 万平方千米被砍伐和退化的森林。

3. 国家层面：拓宽气候议题双多边外交

2022 年 8 月，卢拉首次提出构建“热带雨林国家统一战线”的主张。次年 10 月，巴西、印尼和刚果于刚果首都金沙萨召开了首届“G3 气候峰会”，反映出巴西气候外交战略的新变化，即力求实现雨林资源整合，通过与其他雨林国家的联合，增强雨林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11 月，上述三国正式签署雨林保护协定。^②

卢拉政府还积极参与多边气候外交。相较于博索纳罗政府对国际气候治理合作的漠视，卢拉政府态度十分积极。2023 年 4 月卢拉访华期间，巴中两国发布《巴中应对气候变化声明》，为深化巴中两国的气候合作打下良好基础，在两国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人类公平、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③ 5 月，在参加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加冕礼时，卢拉重申了巴西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④ 同月，巴西政府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会议期间，卢拉分别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举行了双边会晤，阐述了巴西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和未来举措。

在积极参加气候治理外场活动的同时，巴西还积极谋划主场多边外事活动。在 2023 年 11 月第六届巴西投资论坛上，卢拉强调巴西致力于吸引绿色

① “新亚马孙梦想”即拥有更绿色的城市、更清洁的空气、无汞的河流和未受影响的森林的亚马孙；一个为所有人提供食物、有尊严的工作和公共服务的亚马孙；一个能让儿童更健康成长、移民受到良好接待、原住民受到尊重的亚马孙。

② 上述国家分别代表了亚马孙雨林、婆罗洲—湄公河盆地和刚果盆地这三个雨林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

③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Brazil – China Joint Statement o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April 19, 2023. <https://www.gov.br/mre/en/contact-us/press-area/press-releases/brazil-china-joint-statement-on-combating-climate-change>. [2024-06-25]

④ Planalto, “Lula Calls for New Global Governance and Resources for Countries that Harbor Important Nature Reserves”, May 8, 2023. <https://www.gov.br/planalto/en/latest-news/2023/05>. [2024-06-28]

经济项目，以促进巴西向清洁能源领域超级大国转变。在 2024 年 11 月二十国集团巴西峰会上，巴西与该组织成员国充分探讨气候融资等事项，尽管效果甚微，但为 2025 年将于巴西举办的第三十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奠定了良好基础。

回顾上述三个阶段的巴西气候外交进程，不难发现其气候外交战略的阶段性特征与全球气候治理进展、地区治理状况、巴西国内经济态势以及能源政策密切相关。总体而言，自卡多佐政府以来，巴西的气候外交战略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尽管在某些阶段存在弱化现象，但凭借其雨林资源和清洁能源结构的比较优势，巴西始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巴西的气候外交战略并非完善。例如，亚马孙地区治理机制仍需进一步深化，并亟须建立多元化的资金和技术保障机制。此外，巴西还需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继续强化领导力，以应对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复杂挑战。不断完善这些方面有助于巴西在未来更好地发挥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三 巴西气候外交战略的策略调整

通过对巴西气候外交战略的多层级划分及时间跨度的阶段性分析，可以发现不同政府在气候外交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博索纳罗政府时期巴西对气候变化及气候治理相对漠视，与卢拉政府时期的积极作为和深度参与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有必要对不同政府的差异性表现进行分析，具体体现在全球气候变化及应对策略的调整、国际气候治理策略的调整、亚马孙地区主权与国际化冲突应对策略的调整。这些层面的调整反映了巴西在不同政府领导下气候外交政策的变化，揭示了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演变及其背后的政策逻辑。

（一）全球气候变化及应对策略调整

自卡多佐总统执政以来，巴西应对气候变化策略经历了数次调整，尽管部分时期对气候变化认知及应对策略有所倒退，但总体呈现曲折向前的态势。卡多佐基本继承了民选政府初期的气候治理战略，坚持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主张，为全球气候治理提出了诸多高质量的议题和机制设计，例如 1997 年与美国联合提出清洁发展机制。在 1997 年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卡多佐强调，“气候变化关系到保护地球上子孙后代的生活

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想出一些机制来缓解温室气体效应。”^① 卡多佐对待气候治理的立场是积极的，这在其卸任后的发言中也得以证实。2017 年 5 月，卡多佐出席首届巴西温室气体论坛时指出，“气候变化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也是我们的问题。”此后的卢拉总统和罗塞芙总统均来自劳工党。卢拉在其任内进一步提升了巴西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参与度，使巴西逐渐由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方。2007 年，巴西成立“气候变化部际委员会”，构建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架构，为巴西参与国际气候治理奠定了良好基础。卢拉还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主动宣布实施减排计划，对温室气体减排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罗塞芙政府基本延续了卢拉的内政外交战略。一方面，巴西在《巴黎协定》的制定和协调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努力弥合南北方国家之间有关减排责任的分歧，并率先做出实质性让步；另一方面，巴西积极兑现减排承诺，公布并实施国家自主贡献报告。

在特梅尔政府时期，迫于国内经济发展迟滞的困境，气候外交策略与实施基础的明显脱节限制了特梅尔政府气候外交的实施。此后的博索纳罗政府否认气候变化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气候治理，声称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新殖民而编造的虚构叙事”，认为气候治理实为发达国家借气候变化之名行“束缚”发展中国家之实，旨在维护其领导地位与霸权体系。为此，巴西撤回了承办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申请。2023 年卢拉再次执政后，恢复和重建了巴西气候治理机构和合作机制。例如，恢复了“气候变化部际委员会”，任命玛丽娜·席尔瓦重新担任环境部长等；同时，积极参与双多边外交，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在会上发言，重申了巴西对国际气候治理的承诺，并呼吁南北方国家加强气候治理合作。

（二）国际气候治理策略调整

自卡多佐总统执政以来，巴西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策略取向经历了由担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分歧的“协调者”，到追随美国特朗普政府政策取向，再到重新扮演“协调者”的立场转变。

卡多佐执政时期，巴西坚持发达国家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承担历史责任，并与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合作抵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要求，

^①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Fernando Cardoso of Brazil in Brasilia”, October 14, 1997.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the-presidents-news-conference-with-president-fernando-cardoso-brazil-brasilia>. [2024-07-18]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尽管该原则初期遭到发达国家的抵制，但在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共同坚持下，最终在《京都议定书》中得以确认。到第四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巴西代表与其他缔约国积极合作，推动了谈判共识的形成。

劳工党执政时期基本延续了卡多佐政府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立场。卢拉政府主动承担减排责任，引领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同时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减排承诺。巴西坚持《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双轨制”谈判机制，而发达国家为减轻减排责任则主张“单轨制”的谈判模式。在第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丹麦提出的“丹麦方案”主张将气候变化融资的有效控制权交给世界银行，放弃《京都议定书》中具有约束力的减排条约，由发达国家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表现决定是否提供资金支持等。卢拉公开指责该方案的非正义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发展中国家主张减排是发达国家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不必承担减排责任，这加剧了南北方国家之间在国际气候治理议题上的分歧，而巴西主动宣布实施减排计划则减少了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分歧。2015年巴西发布国家自主贡献报告，明确了巴西下阶段的减排目标。概括而言，劳工党执政期间，巴西扮演着南北方国家之间协调者的身份：一方面，引领发展中国家适时调整国际气候治理策略；另一方面，坚持发达国家负有减排责任，并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此后上台的博索纳罗政府对国际气候治理持消极立场，加强与美国合作成为其任内巴西国际气候合作的重点。在其执政前期，博索纳罗否认气候变化是一种“人类危机”的存在，并且认为国际气候治理是某些发达国家为挟持和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虚假合作。到其执政后期，伴随着美国政局和气候立场的变化，博索纳罗对待全球气候治理的态度也有所转变。2021年，在美国拜登政府宣布新的减排计划后，博索纳罗也公布了新的减排计划，要求巴西提前十年实现碳中和目标。

2023年卢拉再次执政后，巴西再度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致力于恢复巴西在气候治理合作中的地位，一方面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合力，另一方面寻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支持。

（三）亚马孙地区主权与国际化冲突应对策略

自卡多佐执政以来，巴西应对亚马孙地区主权与国际化冲突的策略经历了由主动合作到消极抵制，再到主导合作的转变。长期以来，巴西将亚马孙地区主权视为国家核心利益，该地区一直是巴西地缘政治研究中最受关注的

热点之一。^① 亚马孙地区具有地缘政治和气候治理的双重价值：一方面，亚马孙地区涵盖南美 8 国，巴西的亚马孙雨林政策变化直接影响地区治理；另一方面，亚马孙雨林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此，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亚马孙地区治理，主张将亚马孙地区治理纳入国际气候治理范畴，不遗余力地推动亚马孙地区国际化。^② 因此，对巴西而言，亚马孙地区治理面临国家主权与国际化的矛盾。

在卡多佐任内，巴西在坚持地区主权仍是谈判核心的基础上，逐渐有限度地接纳国际社会的治理建议。例如，围绕《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巴西始终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础。在有关雨林问题上，巴西始终反对就亚马孙雨林的减排做出相关规定，以避免国际社会日后对巴西亚马孙地区治理提出质疑和指责。^③ 劳工党执政时期，巴西在处理亚马孙地区治理问题上有了新的变化。2007 年，巴西通过了国家气候变化计划，提出至 2020 年亚马孙地区毁林面积将减少 80%，次年亚马孙基金的成立为地区治理提供了资金支持。2009 年，卢拉政府邀请法国参加亚马孙地区国家首脑峰会，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亚马孙地区治理的呼声，缓和了巴西与欧美大国间在该问题上的矛盾。然而，卢拉也并非无条件顺从国际社会的呼声。例如，2005 年，欧盟贸易专员拉米在联合国会议上主张将亚马孙雨林等“国际资产”转归国际社会集体管理，卢拉对此回应道，“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谁才是亚马孙雨林的主人，亚马孙雨林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巴西人民。”^④

在博索纳罗政府时期，巴西趋于过度强调亚马孙地区主权。从国家利益和主权的角度来看，亚马孙地区国际化势必挑战巴西主权，维护主权即维护巴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这种做法似乎矫枉过正，阻碍了地区治理合作的深化并削弱了既有合作成效。因此，卢拉再次执政后，巴西又开始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并接纳了国际社会对亚马孙地区治理的建议。在 2023 年亚马

^① Wanderley Messias da Costa, “The Brazilian Geopolitics and its Influence on National Strategic Thinking”, in *Géographie Politique et Géopolitique Brésilienne au XXI Siècle*, L’Espace Politique, No. 31, 2017.

^② 周玲妮：《美欧气候领导权博弈背景下巴西亚马孙政策的转变》，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134—152 页。

^③ 贺双荣：《巴西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载《拉丁美洲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26—32 页。

^④ MercoPress, “Brazil Reacts Angrily to Amazon Proposal”, February 26, 2005. <https://en.mercopress.com/2005/02/26/brazil-reacts-angrily-to-amazon-proposal>. [2024-07-18]

孙地区国家首脑峰会开幕式上，卢拉提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三个目标：一是实现该地区发展的可持续和包容性，二是扩大和深化成员间的合作、协调和一体化，三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问题的全球议程中加强热带雨林国家的地位。^①

四 巴西气候外交战略的全球影响

巴西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气候外交战略实践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多维度影响：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深化与完善，实现了多边多领域气候治理的协调互动，塑造了“全球南方”在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并带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与国际合作。这些影响既凸显了巴西作为重要攸关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独特地位，也为弥合气候治理的南北方利益分歧、凝聚全球气候治理共识提供了实践路径，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向更深层次发展。

（一）治理架构层面：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深化与完善

随着全球气候治理成为国际共识，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探讨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②从《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的体系架构逐步构建并趋于完善。与既往国际机制及体系多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模式不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自始便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创建。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减排责任划分、减排目标制定等事宜长期存在分歧，但发展中国家亦通过气候博弈不断增强自身影响力，并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变革与完善。巴西的气候影响力正是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巴西也借此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深化变革和逐步完善。

首先，巴西日益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方。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公平正义且有效的治理方案。自卡多佐执政以来，巴西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诸多高质量的机制和议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巴西长期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清洁发展机制、“双轨制”等重要谈判原则和合

^① Planalto, “Speech by President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during the Amazon Summit with Guest Countries in Belem”, August 12, 2023. <https://www.gov.br/planalto/en/follow-the-government/speeches-statements/2023>. [2024-07-18]

^② 王海林等：《全球气候治理若干关键问题及对策》，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 年第 11 期，第 26-33 页。

作机制，反对发达国家不合理的气候减排安排和责任划分。如上文所述，2009 年巴西与中国、印度等“基础四国”集团成员国和部分七十七国集团成员联合反对美欧发达国家起草的、企图放弃“双轨制”谈判机制并模糊发达国家减排责任的《哥本哈根协议》。在区域气候治理上，特别是在亚马孙地区治理上，巴西倡导和建立了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并争取域外资金设立亚马孙基金，为亚马孙地区治理机制和融资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奠定坚实基础。2023 年《贝伦宣言》进一步扩大了亚马孙地区的治理内容，有助于地区可持续发展。在 2024 年二十国集团里约峰会上，巴西政府明确反对气候单边主义和新型绿色保护主义。此次峰会批准成立“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动员任务组”和“生物经济倡议”，昭示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趋向，进一步强化了气候治理的全球合力。

其次，巴西在全球气候治理博弈中反对零和思维与对立思维，采纳了相对灵活的气候外交战略。在全球气候谈判的框架下，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气候减排责任划分等议题上的长期分歧，巴西持续运用协调策略，有效缓解了南北方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定位不仅取决于其内部考量，亦需获得他国的认同，此点至关重要。事实上，巴西的“协调者”定位愈发凸显并逐渐被南北方国家所接纳，其利益协调策略亦能得到双方认可，因为巴西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另一方面因其自身优势使得发达国家不得不重视其立场。此外，巴西多次主动承担起超越发展中国家常规责任范围的减排任务。在南北方国家多次围绕减排责任产生严重分歧的背景下，“巴西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弥合分歧的积极作用。可见，巴西的气候外交战略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倡导南北方国家间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而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深化与完善。

（二）国际协作层面：实现多边多领域气候治理协调互动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推进和强化有效的全球治理，构建广泛参与、包容开放的多边体系及秩序。^① 气候治理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议题，正面临单边主义盛行与孤立性气候举措等严峻挑战。国际社会亟须强化跨领域、多边气候治理的协调联动，以凝聚全球气候治理的协同效力，并构建基于合作共赢原则的气候治理合作模式。巴西的气候外交战

^① 唐永胜：《世界变局及其对加强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 年第 3 期，第 80—83 页。

略自始便注重多边多领域互动，避免单边主义倾向，通过积极参与多边互动拓展巴西的外交空间并促进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多领域协作并进。从全球层面来看，巴西的气候外交战略与三类国家密切相关。

其一，对美气候外交始终是巴西气候外交的重要构成。一方面，美国对亚马孙雨林长期密切关注，如拜登政府公开指责博索纳罗在亚马孙雨林砍伐问题上不作为，而卢拉则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限制砍伐政策，对此，拜登政府宣布向亚马孙基金捐助 5 亿美元以支持亚马孙地区治理。另一方面，巴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及能源转型等关键领域展开了广泛合作，2023 年卢拉与拜登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即为例证。

其二，对除美国以外的域外大国开展气候外交。自 2023 年起，亚马孙基金的资金来源得到恢复并有所扩大，德国与挪威恢复了原定的资助，法国、英国及瑞士亦加入该基金，确保了基金的有效运作。与此同时，巴西与欧盟的关系长期微妙且复杂，亦是因为欧盟对巴西的外交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巴西雨林保护力度的影响。例如，2019 年亚马孙雨林大火发生后，欧盟宣布援助巴西 2000 万美元以应对火灾，凸显了气候议题在巴欧外交中的核心地位。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虽然欧盟与巴西在减排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但巴西政府的适度妥协对缓解双方矛盾及推动气候合作具有关键作用。

其三，对其他新兴经济体开展气候外交。任何单一新兴经济体都难以仅仅凭自身力量撼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唯有整合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力量才能与欧美发达国家展开博弈，这正是巴西主流战略思维的核心。通过构建与中国、印尼、印度及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气候外交对话和合作机制，巴西不仅参与构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协同合力，同时也显著强化了自身在新兴经济体气候治理架构中的引领地位。

从区域国际战略视角审视，自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巴西逐渐认识到实现拉美一体化的难度，遂将其区域战略重心转向南美一体化，旨在塑造自身的南美洲地区大国身份，并主动肩负大国责任。相较于经济层面的地区组织南方共同市场而言，南美洲国家在气候合作领域尚未构建起一套系统的体制和机制。在区域气候治理的框架内，亚马孙地区治理仍是表现最为突出的案例。巴西充分利用其在气候外交领域的优势，强化自身在区域层面的领导地位，主导成立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并逐渐成为亚马孙地区国家与域外国家沟通的桥梁。例如，巴西多次在国际气候会议上呼吁域外国家为亚马孙地区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三）治理主体层面：塑造“全球南方”气候治理领导力

当今时代，大国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① 尽管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架构自始便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建立和推动，但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发达国家利用气候议题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并在气候议题上长期失信于“全球南方”，从而加剧了南北方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分歧。鉴于此，“全球南方”致力于塑造自身气候治理领导力，维护自身的发展权益及治理话语权。

其一，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全球南方国家的气候治理合力渐趋增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巴西逐步将气候治理纳入国家议程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使气候治理成为其对外战略的关键支柱。如前所述，巴西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协调者”身份定位为南北方国家普遍接受。同时，巴西充分利用现有的全球气候治理架构与机制，积极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提升影响力。在减排方面，2020 年巴西宣布将于 2060 年实现碳中和，此举带动南非、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先后提出更具雄心的气候减排目标。在 2021 年的“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以及 2022 年、2024 年的金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上，新兴经济体的减排目标得以确认，从而有效缩小了全球总体排放预期与《巴黎协定》减排目标之间的差距。在 2024 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西再次更新减排目标，计划于 2035 年实现减排 67% 的目标。在气候融资方面，2024 年 7 月巴西宣布加入全球气候融资框架。同年 11 月份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巴西峰会将全球治理机构改革作为优先议题，峰会通过一项旨在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责任的气候融资协议。针对欧洲国家要求中国和中东主要产油国等国家承担气候融资责任的主张，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致称其有悖于全球气候融资协议的平等原则。因此，从减排和融资两方面看，巴西在既有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下，主动承担减排责任，积极争取气候融资，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坚实的道义支持和资金援助。

其二，巴西倡导全球南方国家建立和发展气候治理的区域性或功能性组织。在全球治理困境日益凸显的当下，区域治理在功能和结构上的价值日益

^① 徐秀军等：《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载《国际论坛》，2024 年第 2 期，第 3—32 页。

提升，全球治理呈现出区域转向的新态势。^① 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同样面临减排分歧常态化、气候融资碎片化等挑战，导致全球性气候治理进展缓慢，既有多边机制“效率赤字”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巴西致力于通过构建区域性或功能性组织应对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困境，从而确保气候治理的实质性深化和推进。一方面，在地区治理目标上，巴西优先聚焦主导地区治理。^② 在亚马孙地区治理上，巴西的作为塑造了亚马孙地区治理合力。传统的亚马孙地区治理内容主要围绕区域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展开。例如，卡多佐政府调停哥伦比亚与秘鲁的军事冲突，卢拉政府帮助稳定委内瑞拉军事政变后的动荡局面等。相较于政治和军事安全等合作，巴西的气候治理举措降低了周边国家的政治及军事担忧。在气候治理上，巴西牵头的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和亚马孙基金使气候治理成为地区治理的核心内容，为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巴西广泛寻求气候治理共识，构建起诸多功能性组织，增强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气候治理话语权。例如，巴西分别与中国、印度及刚果等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差异化的气候合作机制。依托雨林资源优势，巴西与印尼、刚果共同建立了“热带雨林保护联盟”，旨在强化雨林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推动建立公平高效的全球雨林资源管理机制，并争取资金与技术支持。巴西在“基础四国”机制及双边机制协调下的气候治理合作亦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巴西特别关注气候治理中的弱势群体，如推出了“小岛屿国家复原力倡议”，旨在为小岛屿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性资金支持。

总体而言，巴西在传统机制与新兴机制框架下，持续利用其自身优势，构建或优化全球南方国家融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平台，塑造并强化全球南方国家的气候治理协同效能。

（四）能源转型层面：带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与国际合作

在全球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绿色转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绿色发展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关键驱动力。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迫切需要加速能源转型、推进绿色发展。依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大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

^① 刘雪莲、唐新宇：《全球治理走向区域治理？——关于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思考》，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3期，第92-101页。

^②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课题组：《巴西战略环境与战略选择——卢拉回归后的巴西国际战略展望》，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1期，第74-89页。

量的 3/4，因此，能源转型被视作减少碳排放、实现低碳发展路径的核心举措。对于巴西而言，其碳排放主要源自雨林砍伐及农业生产活动，而非像其他传统碳排放大国那样以工业排放为主。20 世纪以来，巴西凭借其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早期投入和发展，形成了显著的比较优势，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特别是促进全球绿色能源转型和构建绿色发展共识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巴西逐步将能源转型置于其经济增长和外交战略的核心位置。

一方面，巴西致力于加快清洁能源转型，强化其在这一领域的比较优势。巴西的清洁能源发展历史悠久，其生物燃料的发展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并因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而得到迅猛发展。目前，巴西在乙醇生产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且乙醇燃料汽车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较高。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自 1997 年卡多佐政府发布《国家能源政策》以来，巴西持续深化能源转型的激励机制和措施。2007 年，卢拉总统首次制定了长期能源战略。2020 年，博索纳罗政府进一步完善了相关政策，推出了能源使用与开发的可持续规划。巴西实施了一系列的能源扶持措施，包括提供融资优惠和税收待遇等。例如，2004—2022 年间巴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累计向能源行业提供了超过 350 亿美元的融资支持。2024 年 1 月，卢拉政府推出的“巴西新工业计划”再次强调了绿色能源转型在国家再工业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通过上述努力，巴西不仅在其国内实现了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经济增长，还在国际上树立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形象，展现了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决心。^①

另一方面，巴西积极促进能源转型的国际合作，致力于塑造全球绿色发展的共识。首先，在国际能源合作方面，巴西表现尤为活跃。2023 年 9 月，巴西与印度和美国联手创立了全球生物燃料联盟，旨在通过协调全球能源市场来促进生物能源的发展。同年 11 月，在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议期间，巴西加入了全球海上风电联盟，以推动其在风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实践并促进全球政策对话。2024 年 11 月，由巴西、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发起的全球清洁能源联盟正式成立，为解决能源转型过程中的融资和技术障碍提供了一个关键平台。其次，在构建全球绿色发展共识方面，巴西亦采取了战略性举措。2023 年 12 月，巴西作为观察员国加入“欧佩克+”，这一举动既反映了巴西近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成功，使其跃

^① 周燕、夏崧泽：《绿色能源转型：巴西的经验》，载《世界知识》，2024 年第 19 期，第 63—65 页。

升为全球第九大石油生产国，也彰显了其利用该平台引导主要产油国将石油收入用于绿色投资、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战略意图。正如卢拉总统所言，尽管不直接参与“欧佩克+”决策，但巴西意在影响成员国的绿色发展方向。综上，巴西的能源战略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五 结语

在美国等传统发达国家长期硬实力优势的影响下，加之国内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巴西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地位趋于边缘化。在此背景下，巴西凭借丰富的雨林资源禀赋与独特的清洁能源结构优势，积极投身气候外交领域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本文通过“多层级治理”理论框架，从全球、区域及国家三个层面系统性剖析巴西气候外交战略的阶段性演变。巴西气候外交战略的阶段性差异包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理解及应对策略的差异、国际气候治理策略的差异、亚马孙地区主权与国际化冲突应对策略的差异。巴西气候外交从治理结构、国际协作、治理主体及能源转型四个层面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深化与完善，实现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多领域协调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全球南方”的气候治理领导力，并利用清洁能源结构的优势逐渐带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与国际合作。

本研究对巴西气候外交战略的演进历程、策略调整及全球影响的探讨，有利于增进对巴西气候外交战略的理解，预见巴西未来的气候外交战略走向。未来，气候外交无疑仍将是巴西外交政策的核心议程之一。深化中国与巴西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不仅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向前迈进的关键一环。中国应主动把握战略机遇，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禀赋，提升对气候外交议题的重视程度，探索差异化、常态化的国际气候治理合作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笔者力求全面深入剖析巴西气候外交战略的多个层面，但本研究尚存局限性，特别是对巴西国内气候外交决策机制的内在逻辑与影响因素的探讨仍有待加强。

（责任编辑 徐 睿）